

散者又半之”，最终留在上海的，不到罢学回国的十分之一。但是，留沪学生非但没有退却，态度相当坚定：“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，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也，纵不失败，长此俯仰随人，长依赖外人之根性，堕独立国民之精神，非丈夫也，我辈只知兴学挽回教育权耳，不知其他。乃以多数之决议为兴学之初步。”^[8]

1906年1月，留日学生各省代表召开会议，定校名为中国公学。刘棣英、朱剑、马和负责起草学校章程。学校仿照同盟会体制设立评议部和执行部，负责校内事务，评议部由全体学生选举代表定期开会，监督弹劾职员，执行部下设斋务、教务、庶务三科，干事由学生投票产生。4月10日，中国公学正式开学，学生共318人，分高等普通预科二班、中学普通四班、师范速成一班、理化专修一班。这最初318人中，“加入同盟会籍者四十余人，随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，前后将近百人；但隶属宪政派者亦有少数”^[9]。

开学之际，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，多起猜疑，赞助的人很少，开办经费除就地向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募得数千元外，其他各界，毫无表现，全凭公学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。^[10]学校教员薪俸没有来源，日用开支无着，伙食不能维持，最严重者，因所租校舍两个月房租未付，勒令迁出，学校遂陷入困境，处于瓦解状态。而当时政治上及社会上的人，均不以中国公学共和制度为然。“求助于官府无效，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”，中国公学创办者姚洪业情急之下，投江自尽。

姚洪业在遗书中写到：“我同志等之组织此公学也，以大公无我之心，行共和之法，而各同志又皆担任义务，权何有乎？利何有乎？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顾，劳劳于此公学者，诚以此公学甚重大，欲以我辈之一腔热诚，俾海内热心之仁人君子怜而维持我公学成立，扶助我公学发达耳。乃自开办以来……海内热力赞助者，除郑京卿孝胥等数人外，殊寥寥。求助于政府无效，求助于官府无效，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。非独无效，且有仇视我公学，毁谤我公学，破坏我公学者。”“故蹈江而死，以谢我无才无识无学无勇不能扶持我公学之罪。”“我愿我诸同学皆曰，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，其临死之言可哀也……而振起精神，尽心扩张，无轻灰心，无争意见……务扶我中国公学，为中国第一学堂，为世界第一学堂而后已。”“我愿我四万万同胞

之官之绅之兵之士之农之工之商皆曰，无学无识无才无勇如某某者，其临死之言可哀也，而贵者施其权，富者施其财，智者施其学问筹划，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。”^[11]

姚洪业的遗书发现后，社会受到很大的震动。中国公学积极走出窘境，振作精神、奔走求助，一方面四处筹款，另一方面改变原来评议部、执行部的设置，实行董事会制度，聘请郑孝胥、张謇、熊希龄等社会名流为董事，将开办时的学生主体的学校改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学校，董事会推举郑孝胥为监督。而此时，郑孝胥、张謇、熊希龄等立宪派出于急于立宪的目的，公开支持中国公学，并力图借助端方力量帮助中国公学。

上海，不仅是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，也是立宪派活动的主阵地。熊希龄联合张謇、郑孝胥、汤寿潜等人扩大影响，在上海进行立宪运动。1906年9月，清廷宣示预备立宪，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，借此时机，熊希龄、郑孝胥等人一起出面请求端方资助。中国公学干事王敬芳善于言辞，推崇端方备至，颇得端方好感。而端方，作为满族权贵中思想最为开明并对最高当局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^[12]，非常热心学务^②。他认为，如果能够资助这批留学生办学，也可算是在任期间的一大政绩，不久，即派江苏候补道夏敬观与宁学司课员桂埴前往该校详细调查。

1907年，端方根据调查结果奏报清廷，请与拨款扩充规模：“该公学学生凡三百十八人，业经逾额。设计高等普通预科二班，中学普通四班，师范速成一班，理化专修一班，其意注重完全高等普通，专为直入东西洋大学高等学校而设。虽师范、理化两班不无欲速之弊，然其教授管理，严肃整齐，极能得自治之精神，守统一之宗旨。惟膳学两费，约收三万元，绅商常捐约一千七百元，不敷在二万元之谱，倘蒙照数筹给，便可措置裕如。其校舍现系租用，月费不资，光线空气皆不合法。若能集资建筑，不独节省租金，并于卫生有益等情。查学部片奏内载嗣后京外派遣游学学生，无论官费私费，皆应切实考验，性行纯谨，具有中学堂毕业程度，通习外国文字能直入高等专门学堂者，始予给咨。又准学部电开：预备游学之学堂，或独设，或合筹，应请察酌会商办理各等语。盖公学宗旨办法，皆与相合，所呈课程各表，虽须稍事改良，然使整理得人，必可日臻进步。”^[13]